

蘇俄新五年計劃的國際因素

呂 律

壹 蘇俄戰後經濟與國際因素

蘇俄經濟的結構，戰前年代和戰後年代是不同的，因此，它的經濟計劃也要隨之而變。

在戰前，正如蘇俄自己時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方面的建設和生產，一切都靠自己，它沒有、事實上也不允許它依靠其他的國家來發展自己的經濟。

戰後的情況就不同了：

首先，因為它利用戰爭的形勢和後果，在東南歐和東北亞建立起十二個共產附庸政權，號稱所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於是它有了附屬國和殖民地，也就是它在經濟上開始有了掠奪剝削的地盤和對象。

其次，戰後的二十幾年，是民族主義思想發展到了巔峰的階段，亞、非、拉丁美洲三個大陸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相繼在聯合國的輔導下得到獨立的地位，新興的國家如雨後春筍，於是蘇俄承機而起，利用「無息貸款」、「經濟合作」、「科學技術合作」、「互利的貿易」，對這些幼小國家推銷「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和作法，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就成為蘇俄剝削的第二類地盤和對象。

最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蘇俄已不再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它在戰時既躋身於同盟國的行列中，戰後又是聯合國的五強之一，所以它同西方工業發達和科學技術進步各國發生較前更為廣泛的經濟聯繫，這是可以理解的。

蘇聯經濟中加重國際因素的作用，雖然自戰後即已開始，但是此種因

素在蘇俄的國民經濟中佔一重要地位，具有一套理論基礎，是起自一九四九年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建立，而成於黑魯曉夫的傑作——國際社會主義勞動分工基本原則的公佈（一九六二年），而負責作此項理論——國際勞動分工、國際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協調經濟互助委員會各國國民經濟計劃——的實踐者，是蘇俄已告失敗的七年計劃。

貳 七年計劃對於國民經濟中國際因素的構想

我們知道，蘇俄的七年計劃，是標榜社會主義體系同資本主義體系從事經濟競賽的一支狂想曲。所謂社會主義體系，當然不是指蘇俄一個國家，而是指蘇俄同其他全體共產國家，起碼是指蘇俄同東歐各附庸國——即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而言。不過，蘇俄的經濟，是所謂社會主義體系的表徵和主力，而其他附庸的經濟僅是附麗蘇俄經濟的組成部份而已。

我們以上的看法和分析，可從以下所引的俄共第廿一次大會關於七年計劃控制數字的決議得到證明。

俄共第廿一次大會的決議認為，「七年計劃開闢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進行經濟競賽的新階段」，蘇俄將「在這場競賽中贏得勝利，並且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拋到後面去」。

這個代表大會堅決相信，「七年計劃的實現將進一步加強作為和平和進步強大堡壘的蘇俄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陣地，將進一步增強和平力量和削

弱戰爭勢力。」

蘇俄所以作這樣樂觀的看法，是因為它相信在七年計劃完成時，蘇俄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工業品產量上將超過當時歐洲最發達的英國和西德，而在這個指標方面躍居第一位。在若干最主要的產品的絕對生產量方面，將超過美國當時的工業生產水平，而在其他產品的絕對生產量方面，將接近美國當時的工業生產水平；到那個時候，重要的農產品總產量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都將超過美國當時的水平。因此，到那個時候，也可能更早些，蘇俄就會在產品的絕對產量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量方面躍居世界第一位。——因此，第二十一代表大會的決議說，「這將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進行和平競賽中取得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進一步，這次大會的決議說，「根據經濟學家的計算，由於七年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以及人民民主國家經濟高速度的發展，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工業品產量將佔世界工業品總產量的一半以上。這樣就將在人類活動具有決定性的物資生產範圍內，保證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佔優勢」。

如何才能保證蘇俄的七年計劃完成和超額完成，如何實現各「人民民主國家」經濟高速度的發展及如何使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工業品產量佔世界工業品總產量的一半以上，這必須通過組織的工作，而實現此項組織工作就必須有一項令人相信的理論基礎。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用說教的方法發揮此項理論說：

——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特點，是隨着它們的不斷前進，相互之間的關係也不斷鞏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也更加加強；

——隨着世界社會主義體系進一步的壯大和加強，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將順利的發展起來。從前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依靠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依靠合作和互助，正在迅速的使自己的經濟和文化趕上去。這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共同水準就會平衡起來，並將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創造前提——這些國家像蘇俄一樣，日益接近建設共產主義的時

間。

俄共第廿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強調說，繼續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加強團結，促使它們發展它們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繫和文化聯繫，促使各「自由民族」

在瑪列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基礎上更加團結，這是蘇俄最重要的一項任務。

結果，事實告訴我們 七年計劃所懸的狂妄目標，距離蘇俄在七年的時間裏所做到的相差太遠，僅就農業一項來說，它不但未做到重要農產品的總產量和按人口計算的產量都將超過美國一九五九年的水準，而且連年以來不斷向加拿大、美國採購小麥和麵粉。

兩個體系的經濟競賽，如果把勝負放在絕對產量和按人口計算的產量的多寡上，我們認為仍非最後的定評，最後的勝負，必須取決於科學技術水準之高下，產品品質之優劣和成本之大小，以及人民生活福利的好壞，蘇俄第一步就在產量上失敗了，所以七年計劃失敗得非常慘。

造成七年計劃失敗的原因，雖然來自各方面的都有，但是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是七年計劃中的國際因素：

首先，使經濟互助委員會主持下的國際勞動分工受一嚴重打擊的，是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一年的脫幅，儘管它是蘇俄集團中最小最窮的一個政權，但是，出去一個絕不如進來一個好。

其次，羅馬尼亞在一九六三年公然反對由莫斯科決定專業，它不甘於為一個農業國，而要自求發展成爲一個工業國。

上述兩件不愉快的脫幅事件，雖然不至於全盤將蘇俄七年計劃利用東歐生產力和潛力的計劃打破，起碼使此項計算陷於混亂，是毫無疑問的。

大陸共匪政權，固然不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員國，它同蘇俄自一九六二年以後的分裂，在表面上對於蘇俄七年計劃的利害關係，不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那樣直接，但是因爲它是共產世界的一個龐然大物，在蘇俄的對外貿易上從一九六〇年的一四九、八七〇萬盧布降爲一九六五年的三七、五五〇萬盧布，即從共產陣營中的第二位降爲第八位，要說它對蘇俄的七年計劃無直接間接的牽制、不利的影響，這是無人相信的。

蘇俄的七年計劃除在共產集團方面蒙受一些始料所不及的挫折外，來自自由世界，特別是來自西方集團的打擊，也相當大。

蘇俄在七年計劃期間，同西方幾個大國（美、英、法、西德，也包括日本在內）的貿易額，雖然多多少少都有增加（祇有法國除外），但是這種增加不能救七年計劃之窮。蘇俄所需要的，是西方禁運表上所列的那些物資和技

術，而這個禁運表儘管已多多少少有了不同的面貌，然而最基本的禁運物資，仍為蘇俄所謀求不到的。譬如美國不接受蘇俄購買成套的化學工業設備，以致它的化學工業（號稱為大化學）在七年計劃期間就得到一個言多於行的結果。

叁 新五年計劃對於國民經濟中國際因素的希望

由於七年計劃對於國際因素的構想未能如願以償，所以新五年計劃對於這一方面的要求，就不像七年計劃那樣主觀和霸道。

新五年計劃認為，蘇俄在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間對外經濟聯繫的重要任務是：進一步發展蘇俄同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聯繫，「并且在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利益兄弟互助的基礎上，利用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的優越性」；用加強貿易聯繫和技術協助鞏固民族經濟獨立的方法，擴大同正在開發中各國的經濟合作；發展同其他外國間的貿易。

爲了實現以上三大任務，新五年計劃規定：

一、在同社會主義各國發展經濟合作方面

——增加蘇俄同其他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商品流轉額，實現業已達成協議的關於進一步完善進出口結構的措施；

——進一步發展各有關國家之間在經濟上有效而穩定的生產專業化和合作化，首先是在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業、電子工業方面；

——擴大科學技術合作，完善合作的方法，發展相互的技術通訊，交換科學技術成就和享受優待權；

——經濟互助委員會各成員國在工業、運輸、貿易方面，在信貸——財政聯繫和國際貨幣清算範圍內，發展新的合理的經濟合作形式；

——各國在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協議的基礎上提供產品，要更廣泛的劃一製品，并且採用進步的規格；

——爲保證有關各國在動力和原料方面的需要，在相互能够接受的條件

上共同努力，進一步發展燃料動力和原料的基地。

這一部份，可以說是蘇俄經濟計劃中國際經濟聯繫的主要部份，假如說這一部份不能協調好，不能將協調的結果置於一個可靠的基礎上，蘇俄新五年計劃不但在這一方面落了空，其他各方面也都要隨之落空。

所以，柯錫金在報告本案時說：「在我國對外經濟聯繫中佔主要地位的，是社會主義各國，它們在蘇俄對外貿易流轉額中的百分比計在七〇%左右。」又說：「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對於我國來說，是其頭等重要意義的一項任務」，因爲「同社會主義體系各國的合作，將協助新五年計劃解決各項任務：蘇俄將爲化學、輕工業、食品工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各企業和各車間採購數千套設備，來自各兄弟國家的供應品，將抵補我國四八%的海運船隻、四〇%的鐵路幹線和工業電氣化的機車、三六%的鐵路客車車廂等等的需要；我們還要採購大量的人民消費品——如像成衣、針織品、鞋類、紡織品、食品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製品……。」

我們認爲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部份關於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的規定與發揮。新五年計劃希望「進一步發展各國之間在經濟上有效而穩定的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柯錫金談到這一點時，他說「在指示草案中也考慮到各社會主義國家在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方面的利害關係」，接着他補充一句，「當然，在社會主義生產協作的基礎上要嚴格遵守每個參加者的利益。」這幅畫面非常清楚，沒有什麼難懂之處：首先，所謂「經濟上有效」，這個結論成立與不成立，要看是不是建立在公認的基礎上，如果不是，祇是少數國家，或者是蘇俄片面的認爲「有效」，這是站不住的。其次，既提出「穩定」的問題，這就是說，在七年計劃期間的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未臻「穩定」，不「穩定」的原因，除了被認爲是在經濟上無效之外，不會再有別的了，羅馬尼亞的脫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柯錫金的報告，更等於爲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的失敗作了註腳，從他的話裏使我們知道，各國對於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沒有興趣，沒有興趣的原因是「在社會主義生產合作化的基礎上」沒有「嚴格遵守每一個參加者的利益」。

新五年計劃對於經濟互助委員會各會員國的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不作硬性的規定（事實上也不可能這樣做），這是俄共新領導階層比黑魯曉夫的聰明之處，看情形他們要將這個希望放在協議的基礎上去求妥慎的解決。

二、同開發中各國的經濟關係方面

——加強同亞、非、拉丁美洲開發中各國的對外關係和經濟合作；

——擴大同開發中各國的貿易，首先增加它們為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正感需要的機器和其他工業品的出口，以及適當增長來自這些國家的農業、工業商品和原料的進口；

——在開發中各國建立民族工業、農業、科學和建築基地、運輸和郵電通訊現代化的工具方面，在進行地質勘探工作及培養專家和熟練工人方面，給予技術的援助。

亞、非、拉三個大陸上所謂開發中的國家，自戰爭結束以後，向為蘇俄努力爭取的新地盤和新對象。這些國家，在目前來說，對於蘇俄的經濟利益并不怎麼大，它所以要努力爭取的道理，是這些國家目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今後具有取之不盡的經濟資源。

柯錫金在報告中說得非常具體，他說：「蘇俄同開發中各國的合作，旨在解決一些根本問題——即建立民族工業最重要的一些部門，培養技術和科學幹部，加強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他又說：「對於開發中各國來說，培養民族幹部具有重大意義，建立此項幹部——這件事的重要性，并不比建設工業企業為小。」

正如柯錫金對亞、非、拉三大陸戰略形勢的分析，在現代的條件下，這些擁有將近全人類一半人口的國家，已經成為反帝鬥爭的舞台，蘇俄同這些年輕國家在經濟上合作，名義上加強它們的經濟力量 and 地位，實際上就是在提高其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比重和經濟比重。事實非常明顯，目前蘇俄在開發中各國建立民族工業，就等於是在「在生產接近原料」的原則上在這些國家開設了一些分廠，不論是機器、還是人，都是為繁榮它的經濟和解決它的困難而動。蘇俄名義上為開發中各國培養的技術和科學幹部，這是遂行前一步驟的當然的一步，除此之外，這些幹部表面上是工程師和科學家，實際上都是俄共所培養的民族共黨幹部，在蘇俄試行失敗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要藉他們向各開發中國家輸出。

所以，蘇俄同開發中各國的經濟合作，從經濟上說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而從政治上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運動。

蘇俄新五年計劃的國際因素

三、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關於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對於蘇俄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聯繫一點，祇是簡單的規定「進一步擴大同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各國的對外貿易」，理由是「它們表示準備同蘇俄發展貿易」，此外再無其他規定。

新五年計劃的指示在這一方面所以不作進一步的規定，因為概括和籠統比列舉和具體的規定好得多，彈性來得大；因為蘇俄同非共國家（尤其是同西方工業發達的一些國家）的貿易，是冷戰的一環，儘管有些唯利是圖的國家逐漸在放寬它們對蘇的出口，但是據柯錫金在報告中說，「西方同蘇俄的貿易關係並未從人為的限制之下得到自由，許多國家還是存在着對蘇俄商品高額的關稅」，又說：「蘇俄的對外貿易遭受美國的干擾」。

新五年計劃指示關於同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提出「進一步擴大」的字樣，如果祇作增加貿易額的解釋，那未免太小看蘇聯在這方面的野心了。我們從柯錫金報告裏知道，蘇俄希望西方國家接受它「長期貿易協定」、「貸款協定」、「特權證」和「許可證」的要求。

肆 蘇俄的經濟愈來愈需要來自美國的國際因素

在現代的條件下，當然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計劃都不可能是閉關自守的，與外界毫無關係的，多少都要有一些國際因素在內。可是，我們敢於說，任何一國的經濟計劃中，國際因素所佔的地位，絕不會比蘇俄更高。

因此之故，如果我們把蘇俄的經濟計劃單純的視為一個內部問題，或者單純的視為蘇俄一國的經濟計劃，這將大錯特錯。柯錫金在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時，在結尾部份說：「我們蘇俄共產黨人，過去和將來永遠是國際主義者，因此，在解決內部問題時，我們是以我國的計劃和行動應當有助於社會主義大家庭、國際工人階級、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新的勝利為出發點。毫無疑問，順利實現進一步高漲和提高蘇俄經濟

效能的宏偉綱領（它正在黨的代表大會討論中），將對世局有其嚴重的影響。

我們知道，蘇俄的新五年計劃是以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為實施的時間範圍，合理的應該是，在今年年初產生俄共的指示，年中就產生正式的計劃，可是事實上所表現的并不如此。這個計劃的指示雖然在本年三月通過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而告產生，但是正式的計劃已到底尚在不可知之天。其故安在？

據我們想：問題不是發生在國內，而是在國外。為了作好各方面的協調工作，在這個指示通過以後，蘇俄同共產集團各國、同開發中各國、同一工業發達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和貿易關係，始終不能達成協議，以致延至今提不出一個正式計劃來。

蘇俄遲遲不提出它的正式計劃，毫無問題是在為實現這個計劃拼湊條件。蘇俄爲了這一點，要從兩方面進行：

一、共產集團方面

第一步要解決的，是蘇俄同各有關國家（即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進行國民經濟計劃協調的工作。據說這一份工作，在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完成以後即已開始進行，并且業已完成。——蘇俄與有關各國分別簽訂一些長期貿易協定和其他經濟協定。它們所規定的相互間商品流轉額都有頗為巨大的增加，一九七〇年的商品流轉額，與一九六五年相比，增加四五%，也就是增長五〇〇億盧布左右，其中：蘇俄同保加利亞的商品流轉額達到七〇億盧布，匈牙利——五七億盧布，東德——一三八億盧布，波蘭——八五億盧布，羅馬尼亞——三八億盧布，捷克——一〇〇億盧布左右。

第二步要解決的，是國際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問題。蘇俄同經濟互助委員會各國之間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期間商品流轉額的增長，將反映在進一步完善多樣形式的經濟合作之上，特別是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五年內這一方面的合作做得好，蘇俄就可從有關各國得到計劃的供應品，就可按計劃發展它的經濟，否則，就要受到阻滯。

截至目前為止，共產集團的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仍舊是蘇俄的利益多於個別合作國家方面的利益，同蘇俄合作的國家祇能在高價之下從蘇俄得到

原料和材料的保證，也祇能在低價之下將自己的產品銷給蘇俄，使它們深受限制，因此，儘管在會議時將生產專業化與協作化作為口頭禪，可是在行動上不作表現，或者有限度的表現。

二、西方集團方面

我們知道，過去蘇俄把它同西方的經濟聯繫一向列為第三。此種列法，并不表示蘇俄不需要同西方諸強發生經濟關係，或者此種經濟關係對它的意義不怎麼大，而是那時它的經濟死守馬列主義理論教條，故意要同資本主義的經濟劃清界限，同時也深恐它的經濟元氣未充，禁不起資本主義經濟乘虛而入的影響。

現在，自實行經濟改革以後，它在生產設備方面的需要，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消費性供應品方面的需要，尤其爲了實現新五年計劃要開始的一些巨型的建設，它們所需要的投資，不借重西方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勢必要交白卷。

爲了打開西方經濟聯繫之門，蘇俄自七年計劃的後期即開始努力，現在，雖然它同英國、法國、日本等工業發達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國家，都已訂有長期貿易協定和貸款協定，但是這仍不能解決它的問題。蘇俄儘管在某些場合，大罵美國封鎖它的對外貿易，是損人也不利己的帝國主義行爲，然而它在另一些場合也不斷表示願與美國進一步發展貿易的關係，因為它知道，真正打開西方經濟聯繫之門，要從美蘇建立起正常的貿易關係開始。

最近，關於美蘇關係日趨接近之說甚囂塵上，我們認爲此種可能性雖然存在，但是要把這種接近想入非非，則大可不必。

現在我們即使假定最近所流傳的是事實，但這種接近亦絕不能超過建立正常經濟關係（特別是貿易關係）的限度。姑不論美國方面在美蘇關係接近以後的目的何在，蘇俄方面却以滿足它經濟上和貿易上的慾望爲止。

目前，蘇俄所苦惱的，我們認爲并不是共匪的反蘇言論和活動，蘇俄非常清楚，祇要毛匪澤東不拋棄馬列主義另外崇信一種新宗教，不但共匪不會再進一步加害於它，而且終有一天俄匪之間有言歸於好的可能。蘇俄眼前所苦惱的是無法打開內部的困難，它既要繁榮經濟，又要加強國防，這兩件事并不是相輔相成的，而是互相水火的，顧此就必須失彼，七年計劃失敗，這

四十七年五月，匪黨正式提出「文化革命」運動，並將「文字改革」列爲「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因爲當時有關「文字改革」的各種方案，雖均已制定公佈，但其距離目標尙遠，且阻力與困難尙多，有待繼續施以壓力，以助其推行。「文化革命」運動，係由劉匪少奇代表匪黨中央提出。劉匪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註四）中說：「黨中央認爲，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基本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計有：

○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逐步發展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關。

○完成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進行漢字的改革。

○消滅「四害」，講究衛生，提倡體育，破除迷信，移風易俗。

○開展羣衆的文化娛樂活動，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

⑤培養新知識份子，改造舊知識份子，建立一支成千萬人的「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隊伍」（包括技術幹部的隊伍，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

上項報告，經匪黨八屆二次會議通過後，旋即在文化教育上掀起一大高潮，同年九月，匪黨中央與僑國務院又聯合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展開了「教育革命」；而掃除文盲工作亦進入新階段，普遍推行「萬民教、全民學」運動。但是由於「生產大躍進」的失敗，蘇俄技術人員的撤退，以及四十九至五十一年間的連續自然災害，給匪區帶來了全面的經濟困難，「文化革命」遂陷于停頓；農民苦于生活困擾、體力不支與勞動強度之繼續增加，對學習文化毫無興趣，因而強迫推行之掃盲運動，亦無形停止。而「文字改革」工作，在四十九年四月匪黨中央宣稱「爲了加速掃盲和減輕兒童學習負擔，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之後，不僅漢字未即繼續簡化，反而連普通話之推廣，以及漢語拼音之推行，都無形中趨向於半停滯狀態。

由於「文化革命」的停頓，共匪對知識份子政策無形中稍予放寬，於是大陸文化學術界的反共反毛活動由暗而明，由消極而積極。因而出現了夏衍

對於「繼承三十年代文藝傳統」的鼓吹，瞿白音的「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論」，翦伯贊的以「歷史主義」爲骨幹的史學綱領，吳晗、田漢的「海瑞罷官」、「謝瑤環」等劇本，以及鄧拓、廖沫沙、吳晗的「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等諷刺性雜文。

（上接第50頁）

一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在蘇俄同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接近之後，也就是兩國在建立起正常的經濟貿易關係之後，蘇俄就可以達到下列一連串的目的：第一、它可以減輕軍備競賽的負擔，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到經濟建設的投資上；第二、它可以從美國方面得到它想望已久的化學工業成套設備、最新科學技術成就的交換，一筆數目鉅大的貸款；第三、它可以放手同英國、西德、日本及其他北大西洋工業發達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和貿易活動；第四、可以澈底的將西方行了多年的禁運表變成一張廢紙。

總而言之，國際因素在蘇俄的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地位，比任何一國爲高，它每一個計劃努力的目標，并不是同一一般一樣，如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而是在如何提高蘇俄對國際上的影響。柯錫金在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時就說：「假如說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對蘇俄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局勢有其愈來愈加增長的影響，則世界局勢也以一定的程度來影響我國的計劃，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進行、速度和遠景。」跟着他更明白的說：「假如說一切祇是以我國爲轉移的話，我們毫無問題就要走向實質的裁減軍事支出，并且適當的擴大用於國民經濟平時各部門、用於進一步增加國民收入中消費方面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比。」

我們從柯錫金這幾句話裏得到一個答案，正式的新五年計劃難產的原因，是蘇俄正在謀求如何裁減軍事支出和進一步增加國民收入中消費方面基本建設的百分比。前一個任務是消極的，後一個是積極的，客觀上的形勢限定蘇俄，必須先完成消極方面的任務，才能達到積極方面的目的。蘇俄要完成它消極方面的任務的話，就不得不謀求與美國的關係進一步接近。

至於說美蘇關係進一步接近以後，有共同制匪的作用，那祇能說蘇俄在國內的經濟問題解決以後，它已無內顧之憂，可以行有餘力的去專心解決匪俄之間的問題，當作一種副產品來看則可，當作一種正產品看則期以爲不可。